

徐大纲 著

熊伯龍家世及行年考略

徐大纲 著

熊伯龍家世及行年考略



长江出版传媒
湖北人民出版社

鄂新登字 0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熊伯龙家世及行年考略/徐大纲著.
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2012.12

ISBN 978 - 7 - 216 - 07403 - 2

I. 熊…

II. 徐…

III. 熊伯龙(1617 ~ 1669)—人物研究

IV. B249.9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31151 号

熊伯龙家世及行年考略

徐大纲 著

出版发行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印刷: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经销:湖北省新华书店

开本: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张:14

字数:393 千字

插页:4

版次:2012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次: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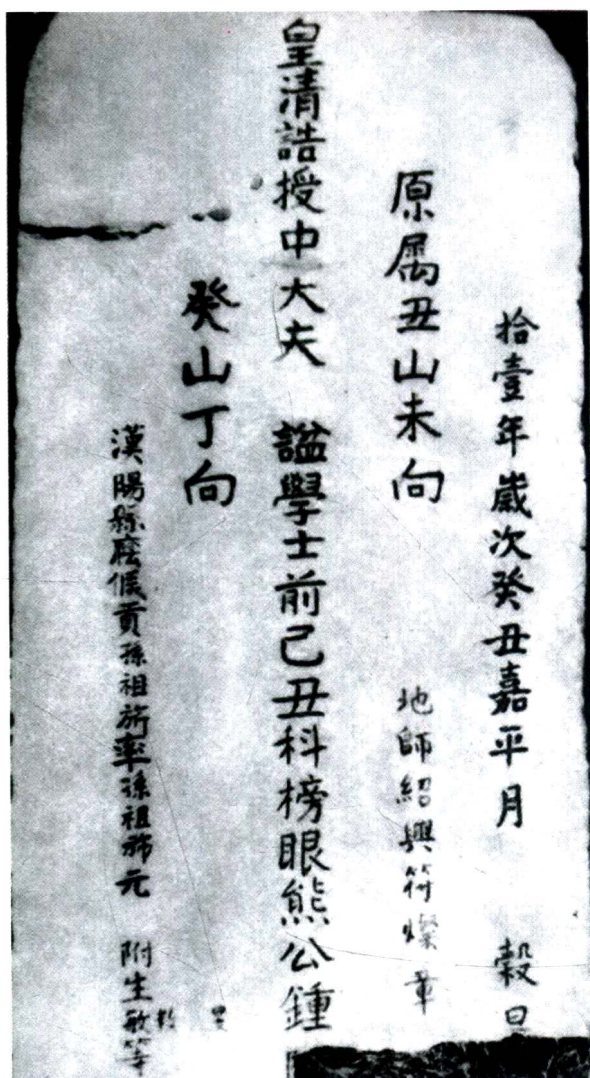
书号:ISBN 978 - 7 - 216 - 07403 - 2

定价:42.00 元

本社网址:<http://www.hbpp.com.cn>



▲ 本书作者在熊伯龙墓前留影



▲ 熊祖旂在雍正十一年癸丑腊月（1734年1月）为其先祖熊伯龙所立之碑。现藏武汉市蔡甸区博物馆

狄古之不附於梁公也竊攷西晉時有熊伯
循任黃州刺史復任饒州俱有惠德及人卜
居鄱陽爲江西熊氏祖此係族之遠祖也晉
族自豫章汪籍湖北楚地楚先君分列三楚
始祖兄弟三人先至黃岡麻城後建安邑分
支又分居孝感河南西屬光羅諸郡龍父又
自安邑太仙鄉豹子山携譜而遷漢陽普原
一脉相傳淵源有自也夫萬物本乎天人則

本乎祖木本水源可不尋其所自始龍奉先
父遺言數至豹子山桃花鎮熊家河親祭
祖墳而外與先諸兄伯達伯适伯遺伯逸後
裔四顧而樂之曰此龍父身之所自出也然
倖列朝堂其來也有限言論之餘又不禁
流連不忍去因援筆而爲叙欲與龍所作安
邑誌叙并傳不朽云

後世孫伯龍謹識

熊伯龍爲黃安《熊氏宗譜》
撰写的叙



熊學士詩集卷之上目錄

詩

教居

喜雨

哭大父示仲叔兩弟

聞襄陽陷

魏徐隨州刺史

月湖夜泛同朱君燮陳小有梅瘦橫黃敬諭子

威李良玉文歸胡石室諸子

熊學士文集卷之下目錄

祭文

祭高祖考北窗公丈

祭曾祖考楚潤府君丈

祭千里蕭公外舅丈

祭洞門趙尚書丈

祭少宰雪堂兄丈

祭十影庵丈

祭曹學士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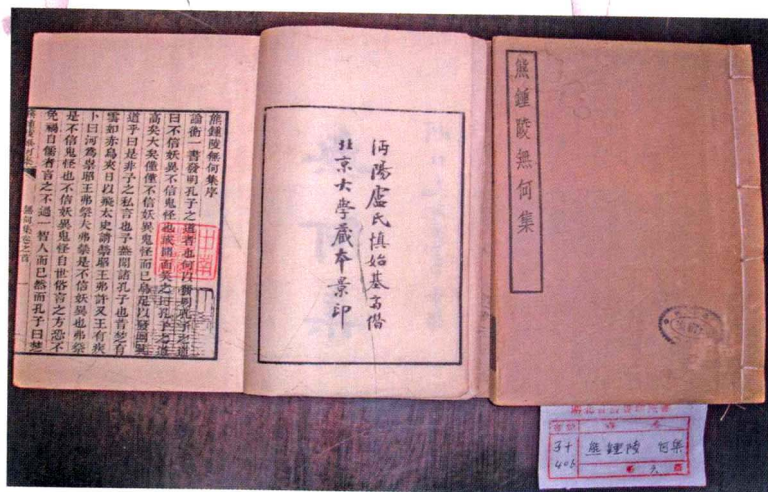
建寧縣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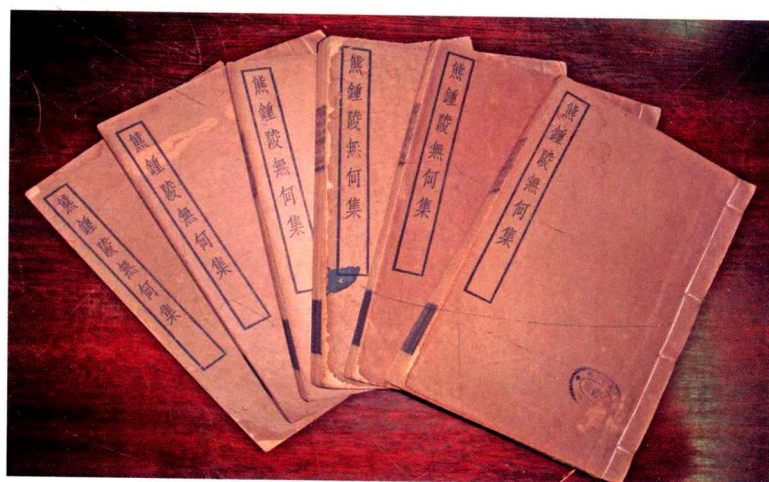
熊學士文集
(續校定全集)
8-318

《熊学士诗文集》熊光修补本易名《穀詒堂全集》





熊伯龙哲学著作《無何集》



前言

熊伯龙是明清之际的一位学者、无神论思想家、诗人。

明朝中期以后，宦官专权，吏治腐败，官绅兼并土地，社会经济日益衰落；边患屡起。内忧外患，已经危及到朱明王朝的腐朽统治。兴利除弊，要求改革，成为朝野上下的一致呼声。大学士张居正是历经嘉靖、隆庆、万历三朝的老臣，他谙悉朝政，胸怀经济大略。隆庆末年，张居正出任首辅，辅佐幼帝神宗，锐意改革，力图振兴封建王朝的衰弱局面。从万历元年（1573年）至万历十年（1582年），张居正大力整顿吏治，鼓励农商，巩固国防，取得了卓著的政绩，“十年来，海内肃清。用李成梁、戚继光委以边北，攘地千里，荒野蕃服。南蛮累世负固者，次第遣将削平之，力筹富国，太仓粟可支十年，罔寺积金至四百余万。成君德，抑近幸，严考成，覆名实，清邮传，核地亩，一时治绩炳然。”^①张居正在任首辅十年中，不仅进行了政治、经济、军事方面的重大改革，而且还进行了教育改革和学风整顿。明朝中期以后，风行王守仁（阳明）的“知良知”的理学，读书人空谈性理，形成脱离实际的不良学风。张居正反对空谈，提倡经世致用，求躬行之实效。他说：“仆愿今之学者，以足踏实地为功，以崇尚本质为行，以遵守成宪为准，以诚信顺上为忠。”^②在张居正提倡的经邦济世的务实学风影响下，形成明末经世致用思潮，涌现出许多务实的学者，如徐光启“雅负经济才，有志用世。”成进士后，从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学习天文，历算，火器，尽其术。又与他翻译欧

① 清·谷应泰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卷六一《江陵柄政》。

② 明·张居正《张太岳集》卷二九《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》。

几里德《几何原本》等书，且“遍习兵机，屯田，盐荚，水利诸书。”^①旧历书推算日食失验，徐光启聘请西方传教士龙华民、邓玉涵、罗雅谷、汤若望等参与修理历书，历时三年，修成《崇祯历书》，为我国参用西法之始。

崇祯十一年，著名文社——几社的主要成员陈子龙与徐孚远编订五百余卷《皇明经世文编》，是书“学术渊深，足为世用，一称立言之家，一为实用之准。”^②次年，陈子龙又整理编订徐光启所著《农政全书》。陈子龙等人所做的这些工作，可以说是对明末方兴未艾的经世致用思潮推波助澜，对明清之际的务实学风树立了垂范作用。继徐光启之后，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夫之、徐宏祖、方以智、熊伯龙等接踵而来，他们从各自的治学领域，不谋而合地走上经世致用的治学道路，对中国古代的文化思想作出了杰出的贡献。方以智学识渊博，“群经子史略能背诵，博涉多奇，所与游皆四方豪俊，凡天人、礼乐、律数、声音、文字、书画、医药，下逮琴剑技勇，无不析其旨趣，著书数十万言。”^③方以智年轻时便关注中国传统自然科学与西方自然科学的比较研究，并向西方传教士请教天文、历算等科学知识，所著《物理小识》对后世均有深远的影响。熊伯龙自幼不信天命，不信神仙鬼怪、祸福报应之说，他博览古今，勤于思辨，在经世致用思潮和务实学风的熏陶下，早年就写出了《适逢说》、《鬼辩》等具有无神论思想的文章。入仕以后，结识汤若望、南怀仁等西方人士，有机会读到他们所著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，眼界为之一新，从而更加坚定唯物主义的认识观，写出自汉代王充《论衡》之后，又一部杰出的无神论哲学著作《无何集》。可以说，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夕阳残照中，徐光启、方以智、熊伯龙是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，是最早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先驱者。

① 《明史》卷二五一《徐光启传》。

② 明·宋征璧《皇明经世文编》凡例。几社，崇祯二年（1629年）成立，由夏允彝、杜麐征、周立勋、徐孚远、彭一宾、陈子龙组成，号称“几社六子”，其中，彭一宾与熊伯龙有所交往。

③ 马其昶《桐城耆旧传》卷六《方密之先生传》。

二

熊伯龙，字次侯，号钟陵，别号塞斋。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（1617年），卒于清康熙八年末（公元1670年），湖北汉阳（今武汉）人。他的祖上原籍江西进贤县，六世祖时迁居湖北黄安。曾祖熊珙早年游学汉阳，善于交往，便以汉阳籍考取了明楚王府典宝，做上了楚王府的司印官。祖父熊士章随侍身边，与江夏郭正域、任家相结为好友，称名诸生。郭正域、任家相少有文名，独树文坛，时人以“任郭”并称。熊伯龙祖父为贡生，恬淡仕途，一生乐善好施，同情贫苦百姓。在郭、任、熊三人中，熊士章年寿最高，享年八十七岁。^①崇祯十三年（1640年）冬，湖广干旱严重，汉阳府城外的月湖水涸竭，湖面龟裂，可以行人，熊士章在这一年无疾而终，熊伯龙时年二十三岁。熊伯龙在《哭大父示仲叔两弟》诗中说：“失父年十六，七年祖又离。父死有老祖，祖死无长儿。”家庭的重担便落在他的肩上了。

熊伯龙父亲熊万选，字鸣盛，又字彦升，以字行。深通经传，旁及子史，明熹宗天启元年（1621年）辛酉举人，座师缪昌期十分器重他，与彝陵（今宜昌市）文安之相期许。次年，文安之考中进士，熊鸣盛却落选了。熊鸣盛自天启二年（1622年）壬戌会试落第之后，直考到崇祯四年（1631年）辛未科，仍然没有考取进士，这期间，熊鸣盛可能遭母丧，守制三年以后，他又参加了两次会试，即崇祯元年（1628年）戊辰科一次和崇祯四年（1631年）辛未科一次。辛未科会试下第后，熊鸣盛“忽忽不乐，语人曰：‘天下事可知矣’。遂一意教子，不复上公车。”^②从“天下事可知矣”一语中，可知熊鸣盛是一位关心世事，有志用世的读书人。在熊伯龙十六岁的时候，他便抑郁离世了。

熊伯龙生活在明清更迭之际。崇祯九年（1636年），地处北陲的

① 《国朝鼎甲征信录》卷一。

② 《康熙湖广通志》卷三二《人物志·熊鸣盛传》。

后金爱新觉罗氏改国号为清。明末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腐朽的朱明王朝，由于吴三桂叛变，敞开关门，让爱新觉罗氏的大军长驱直入，夺取了农民起义的果实，定鼎北京，入主中原。熊伯龙在明朝生活了二十七年，在清朝生活了二十六年。他与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夫之、方以智、吴伟业是同辈人。顾、黄、王、方至死不与清朝合作，始终以明朝遗民自居。方以智出家为僧，潜心学术。吴伟业年长熊伯龙八岁，他在前朝崇祯时已官至南京国子监司业，南明弘光时又起用为詹事府庶子，入清后，他不堪寂寞，屈志失节，应荐做了清朝的国子监祭酒。晚年，他对自己入清为官悔恨无比，其临终诗云：“忍死偷生廿载余，而今罪孽怎消除？受恩欠债应填补，总比鸿毛也不如！”^①熊伯龙与吴伟业不一样，熊伯龙在明朝只是一个小秀才，一个普通的平民知识分子，他顺应时代的发展，做了清朝的子民，顺理成章而无可非议。各人的生活环境和处世态度不一样，熊伯龙走的是“学而优则仕”的传统道路，他的人生愿望是通过获得功名去“泽被生民”。^②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夫之等人是抗清志士，他们以高洁的民族气节赢得时人和后世的尊敬。我们不能以顾炎武等人的生活经历苛求于熊伯龙，亦不能将熊伯龙与入仕清朝的吴伟业等同看待，重要的是要审视熊伯龙入清以后，尤其是入仕以后，对待人民的态度以及对于历史的进步是否作出了贡献。

顺治六年（1649年）己丑，清朝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，进一步地笼络汉族知识分子，举行入主中原后的第三次会考，熊伯龙以殿试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，走上了梦寐以求的仕宦道路。顺治己丑会试，湖广独占鳌头，一甲进士第一名和第二名的桂冠均为湖广学子所得，殿试传胪“状元刘子壮对策称旨，亲定一甲一名，与榜眼熊伯龙齐名。”^③《清史列传·文苑》熊伯龙传云：“顺治六年一甲二名进士，授国史馆编修，十一年充浙江乡试正考官，十六年奉命提督顺天学

① 《吴梅村全集》卷二十《诗后集十二》。

② 清·王清《熊学士诗文集序》、《清史列传·文苑》卷七十《熊伯龙传》。

③ 清·余金《熙朝新语》卷一，《清史列传》卷七十《熊伯龙传》，王中翰点校，中华书局出版。

政，累官祭酒，侍读学士，洊升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。伯龙博学，工诗古文词，制艺尤精，与刘子壮齐名，世称熊刘。所为古文，雄浑雅健，在陈廷敬、张玉书之间。诗直抒胸臆，五言古体尤有太古之音。性谨厚，自少至老，手一编不置。历官二十年，恂恂如诸生，不妄交游，不立崖岸，易箴时，惟以不得泽被生民为憾，著有《谷谿堂集》，集中代言诸作，尤朴茂有东京之遗。”^①

《清史列传》记熊伯龙在顺治十六年奉命提督顺天学政，这是不合史实的，《清世祖实录》载，熊伯龙任顺天学政的时间是在顺治十四年十月十一日（1657年11月6日）。^②《清史列传》又说他所为古文在陈廷敬、张玉书之间，这样的相比较亦欠允当。陈廷敬生于明崇祯十二年（1639年），张玉书生于明崇祯十五年（1642年），陈、张入仕之后，皆受到康熙帝眷遇，官至大学士，卒后均谥“文贞”。就年龄而论，当是熊伯龙的晚辈，两人与熊伯龙的关系皆友好，陈廷敬三十初度，熊伯龙有诗《陈说岩太史三十初度赋赠》；张玉书之兄张玉裁成进士后，与其兄合刻所作制艺文，请熊伯龙遴选，并作《两张太史制艺合刻序》予以推崇。陈廷敬、张玉书在康熙一朝的中后期，位至显要，文章大家，廷敬有《午亭文编》饮誉文坛，玉书以《张文贞公集》称颂后世。两人奉敕编订《佩文韵府》和《康熙字典》，播惠后世。两人又深通理学，颇得康熙帝眷爱。熊伯龙谙悉理学，但不专研理学。他的内弟萧企昭研究理学，尊法朱子，诋斥阳明。企昭在京师撰《燕台十二义》，熊伯龙为之作序，名动公卿。熊伯龙在其序中只谈为学之道，不言性理。这不仅是治学的途径不同，更重要的是为学的旨趣各异。陈廷敬为文清雅醇厚，张玉书为文春容典雅，熊伯龙为文雄浑雅健，三人格调各俱风采。读陈、张之文，满篇皇恩浩荡，处处诚惶诚恐，这在熊伯龙的文章里是看不到的。熊伯龙犹如一位耿介之士，直抒胸臆，一吐为快，别具一格，非陈、张二

① 《谷谿堂集》即《谷谿堂全集》。在《清史稿·艺文志》、《四库全书》别集存目中称《熊学士诗文集》。

② 《清世祖实录》卷一一三。

人可比拟。

在熊伯龙《无何集·自序一》后，附有衡衡子按语云：

“按伯龙先生……精字母反切之学，知西洋天文算法，又能通佛经，解翻译。其杂著似唐荆川，律诗类《中州集》。楷法、篆隶、弓马、琴棋，无一不工。对客挥麈，宋人理学，晋人清谈，兼而有之。世人仅以制艺称之，不知实先生之余技也。”

衡衡子的按语不仅指出了熊伯龙诗文风格形成的渊源，更独具慧眼地指出“世人仅以制艺称之，不知实先生之余技也。”衡衡子按语平实而中肯，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熊伯龙。

熊伯龙历官二十年中，遇到的是两个年幼的皇帝。熊伯龙入仕之初，顺治帝福临年仅十一岁，国政掌握在睿亲王多尔衮手里。顺治十八年，顺治帝死，年仅二十四岁，他的第三子玄烨八岁即位，是为康熙帝。遗诏由索尼、苏克萨哈、遏必隆、鳌拜四大臣辅政。不久，索尼衰老病故，鳌拜擅权自专。在顺治、康熙两帝年少亲政之初，发生过两次重大的权力斗争，熊伯龙因此也经历了与之有关的两次政治风波。一次是顺治八年，睿亲王多尔衮死后被指控其生前“谋逆”，顺治帝将他削爵，废除所赐之尊号，曾依附于多尔衮的官员有的被处死，有的遭贬黜。一年后，发生了与多尔衮有关系的陈名夏案。陈名夏是前明复社成员，有文名，崇祯十六年癸未科一甲第三名进士。李自成破京师，他被迫在大顺政权任职，入清后，官至内秘书院大学士兼吏部尚书。陈名夏曾追随满清吏部尚书谭泰，谭泰又因阿附多尔衮而伏诛。在此之前，御史张煊曾弹劾陈名夏结党营私，铨选不公，谭泰为陈名夏开脱，不予问罪。及谭泰伏诛，张煊劾陈名夏一案复提起，交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审讯，论死，因顺治帝有旨，凡与谭泰有干连之人，皆从宽免议，这一次陈名夏虽然从宽免议，但顺治帝对他的印象已经很不好了，斥责“名夏为辗转矫诈之小人”。^①陈名夏被革职，同闲散官随朝听问。顺治九年，陈名夏官复原职，远在故乡汉阳休假的熊伯龙得到这个消息，立即写了《夏杪奉简陈百史太宰》诗，

^① 《清世祖实录》卷六二，《清史稿》卷二四五《陈名夏传》。

向陈名夏表示祝贺，诗中有“圣主目知生甫意，肯容六月有飞霜”之句。然而，熊伯龙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，他不知道其中还潜伏着深刻的政治危机。

顺治十年（1653年）三月，被罢黜的大学士冯铨又重新起用，与陈名夏同在内院共事。冯铨原是前明阉党魏忠贤的显要人物，曾参与迫害东林人士，与复社人士亦积怨颇深。入清后，他立即剃发，举家男女皆服满装，表示自己愿做清朝臣民的诚意。一日，顺治帝召见冯铨、陈名夏等汉官，语及翰林官贤否，冯铨对曰：“皇上简用贤才，亦不宜止论其文……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，北人短于文而行可嘉……文行优长，办事有能者，兼而用之可也。”^①藉此影射攻击陈名夏，贬抑南方籍官员。冯、陈之间的明争暗斗，实质上仍然是明末党争的继续。顺治十一年（1654年）三月，跟随满洲贵族入关的汉裔大学士宁完我弹劾陈名夏，其中最主要一条是告发陈名夏“痛恨我国削发，鄙陋我国衣冠，蛊惑明绅，号召南党，布假局以行私，藏祸心而倡乱。”^②剃发易服，是清朝入关之初的既定法律，在审讯陈名夏的议政王会议上，宁完我和刘正宗作证陈名夏曾对他两人说过终止剃发易服，国家始得安宁的话，因此激怒了年轻的顺治帝，将他处以绞刑。陈名夏为求国家安宁，民族和睦，不赞成剃发易服，说了诚实话，他不过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而已。

陈名夏早年游江汉，与熊伯龙挚友李昌祚订交，陈名夏把江南文士的结社风气带到了江汉，通过李昌祚团结汉阳、黄冈等地之能文者二十二人，创建“寻社”，声噪东南间。熊伯龙因为祖父守制等原因，此时未能结识陈名夏，经朋友介绍，陈名夏已悉知熊伯龙的人品和学问，因此两人神交已久。熊伯龙成进士后，与陈名夏同在翰林院共事。陈名夏爱才好士，他收集熊伯龙历年所作制艺，加以点评，名曰《熊次侯先生传稿全集》付梓行世，熊伯龙当然十分感激，引为知己。陈名夏被诛后，宁完我列出四十一人名单，以陈名夏“南党”

① 《清世祖实录》卷七三。

② 《清世祖实录》卷八二。

党羽呈奏顺治帝，一时举朝惶恐，这四十一人名单中是否有熊伯龙和他的朋友李昌祚，不得而知，但熊伯龙、李昌祚确实被牵连到陈案中去了。熊赐履在应李昌祚之子李必果请求而撰写的《通议大夫大理寺卿李公昌祚神道碑》中说：“……以公之贤，海内咸其信之，而议者犹以附和溧阳，安丘为疑，至行诸奏章，当时士大夫已悉知其罔，亦可以弗辩矣。”^① 溧阳，乃陈名夏，安丘，乃刘正宗，因以地望称。刘正宗是前明崇祯元年（1628年）戊辰进士，入清，官至文华殿大学士。他是宁完我、冯铨派系中人。还有李昌祚妻弟李以笃作的《姊婿李来园先生哀辞》亦云：“癸巳，溧阳之钩党已出人意。”^② 熊伯龙面对陈名夏案缄口不言，他的态度是宁可罢官回老家，亦不做如西汉时，向王莽告密的卑鄙小人王丹。熊伯龙在《雨中有感示萧文远》诗中说：“姓字聊供客，风波只此官。终非人负我，未忍学王丹。”所幸顺治帝未予追究这个黑名单，并传旨：“不许再借陈名夏亲戚、党羽进奏。”^③ 陈名夏一案终于平息下来，三个月后，熊伯龙受命典试浙江。陈名夏一案是熊伯龙政治生活中的一次严重打击，在熊伯龙的心灵上产生了沉重的创伤。熊伯龙在《送同年何侍读省斋南还》诗中说：“宁为君比紫兰锄，可堪我厄黄杨闰。君锄我厄总休论，开襟且复倒芳樽。”宦途的险恶叵测，使熊伯龙从此恬淡仕进，把精力放在他的哲学著作《无何集》的撰述中去了。

第二次政治风波是发生在顺治末年至康熙初年的历法斗争，熊伯龙称之为“历讼”。顺治十七年杨光先向礼部递《正国体呈》，控告钦天监监正、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借修大清历法以张西洋，借西洋新法阴行邪教，在《时宪历书》封面题“依西洋新法”，是“暗窃正朔之权予以西洋，而明谓大清奉西洋之正朔。”^④ 他在《日食天象验》一

① 清·熊赐履《经义斋集》卷七。陈名夏，江苏溧阳人，刘正宗，山东安丘人，故以地望称。刘正宗，字宪石，冯铨、宁完我派系中人，后坐事论死，以年老从宽，夺职回籍。

② 清·李以笃《菜根堂集》卷下。

③ 《清世祖实录》卷八三。

④ 清·杨光先《不得已·正国体呈稿》。